

· 目 录 ·

广州华侨研究会会长钟云天的讲话·····	(1)
广州市副市长陈绮绮致开幕词·····	(2)
南洋学会副会长林我铃教授谈会议感想·····	(3)
南洋学会的回顾与前瞻·····	林我铃 (4)
澳华历史、现况与将来·····	颜清煌 (15)
近几十年来有关新、马华人著作方面的成就·····	崔贵强 (24)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许肇琳的发言·····	(44)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研究及 教学的主要特点·····	余以平 (48)
广州华侨研究会的研究活动·····	刘 青 (54)
近年广东华侨问题研究的概况、特点、成果·····	李 真 (59)
我国对华侨史的研究和探索·····	余思伟 (66)
暨大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的小结讲话·····	(77)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研究及对我们的启示·····	温北炎 (78)



编辑：广州华侨研究会

地址：东风东472号

承印：广东省委党校印刷厂

广州华侨研究会会长钟云天 的讲话

各位先生、女士，同志们：

由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和广州华侨研究会联合举行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交流会。参加今天会议的有来自国内外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专家、学者，包括新加坡南洋学会副会长林我玲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汉语中心主任崔贵强博士，新加坡中华经济研究院李绳毅博士，澳大利亚阿德华德大学历史系颜清湟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冯小丽女士，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陈乔之副教授和副所长温北炎，华侨研究所所长徐善福副教授和副所长余以平，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张映秋和副所长许肇琳副教授，以及其它高等院校、社会科学 departments 一些专家、学者。

出席今天会议的有广州华侨研究会名誉会长、主管侨务工作的副市长陈绮绮，广东省侨办顾问杨山，广州市政府办公厅主任李祯荪，市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李明等。

准备在今天会议上发言的有林我玲、崔贵强、李绳毅、颜清湟博士，分别介绍新加坡、澳大利亚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情况；余以平介绍暨南大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情况；许肇琳介绍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情况；李真、余思伟分别介绍广东省和全国侨史研究情况；刘青介绍广州华侨研究会活动情况等。

现在先请广州华侨研究会名誉会长、广州市副市长陈绮绮致开幕词。

陈绮绮副市长致开幕词

各位先生、来宾：

今天，广州华侨研究会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在这里联合举行“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交流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着重研究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问题的情况，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对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华侨的历史源远流长，他们对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对祖国和所在国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已载入了史册，为人世所称道。随着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变，大多数的华侨加入了当地的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因而出现了新的情况，常要我们探索和研究，象今天这样的交流是很有必要的。广州对外开放比较早，对外的交往也比较多，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出国经商，进行文化交流。今天有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教授，这些国家和我们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广州市是全国14个开放城市之一，较其他城市开放得比较早，今后要更多的参与各种国际活动，让世界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我们广州市。现在各位亲自来到广州给我们送宝，把研究的成果送上门来，我们特别的表示感谢！同时也欢迎你们到各处走一走，给我们提意见，所谓“旁观者清”，你们的意见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

南洋学会副会长林我铃教授 谈会议感想

今天，我们海外来的几位，是应广州市侨务办公室、广州华侨研究会的邀请，来参加“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交流会”的，同时我们又接到许多单位关于研究华侨问题的报告。从接到的报告材料中，使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想不到在广州竟有这么多的机构和人员研究这个问题。虽然这种现象不但海外有，而且台湾也有，但我觉得，这里是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我们希望海外学者以后在外边要向广州市这个地方研究的热情精神学习，我们很想以后多多接触，对我们是会有很大的帮助支持的。

谢谢诸位。

（根据录音整理）

南洋学会的回顾与前瞻 *

南洋学会副会长 林我铃

四十五年前，受聘于星洲日报编纂“星洲十年”及担任南洋文化副编辑的姚楠、张礼千、许云樵诸人，他们从工作中对研究南洋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发觉过去中国一般关于南洋研究的书刊常有以下的弊病：或论据不足，言过其实；或文不对题，隔靴搔痒；或但凭传述，写成海外奇谈；或不分皂白，翻译了事。其主要原因多是撰稿人未曾南来，对这类荒土所有事物，模糊不清，或因缺乏可靠的参考资料所致。当时姚楠等人身居东南亚中心，周遭事物对他们来说是有近水楼台之便，要搜集资料亦事半功倍，正是做南洋研究的最好地方。于是联合了关楚璞、郁达夫、刘士木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于一九四〇年三月组织南洋学会。《南洋学报》亦随之于夏间出版。日军占领期间，停止活动约四、五年。战后又重整旗鼓，再接再厉，逐年出版学报。想不到在往后的年月中，竟吸引了许多华族知识分子及外国学者纷纷加入，鼎盛时会员多达三百余人，学报则每年出一卷，每卷一辑或两辑，历年惨淡经营，到1985年已出四十卷。此外学会又出版丛书及英文《南洋评论》等。四十五年来，沧海桑田，南洋学会仍屹然稳立，我们岂可不拊掌称庆乎！

或者有人会说，这有什么稀罕？岂不见在东南亚早有同

类的学会，例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法国的亚洲学会及在河内设立的法国远东学院，著名史学家伯希和就是在那边主持出版被史学家们视为珍宝的书报。还有那一百五十年前已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学会，在1840年刊印的学报上登有一长篇译自中文的《开吧历代史纪》，记录自明万历到清乾隆末年共约两百年间爪哇华侨事迹，篇幅之大可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在巴达维亚还有个吧城学艺会。上述各学会历年出版物之多，何止汗牛充栋，南洋学会焉得与其一比？

但是这话却似是而非。追溯上述诸学会的发起，都有殖民地主义国家做后盾。对这些统治者，所有关于各地的物产民情、历史地理的研究报告，都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各属地，以便施行适当的对策。依同样的理由，我们大可一提日本。在东京老早有“南洋协会”和“产业馆”等机关，在南洋各地设支部并发行《南洋月刊》，在日治下的台湾总督府也出版一巨套《南洋文库》。最出奇的是那与南洋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东北，日本在那边经营的“南满铁路局”也出了一套有分量的《南洋华侨丛书》。日本人对南洋各地的调查报告可说包罗万象，无孔不入。较诸上述诸学会所作的研究，恐更胜一筹。原来日本早拟步英、法、荷等国的后尘，一直处心积虑，阴谋拓展殖民地。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一声炮响，日军南进，兵不血刃，所向披靡，不数月便完成一个“大东亚共荣圈”，扬威于世。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几十年，有些日本学者对南洋研究的成果，都在此派上了用场，未免令人感叹！

南洋学会是个纯粹以研究学术为目的的团体，绝不可与上述团体相提并论。我们没有任何政府或大机构做靠山。经

济不足时，祇赖社会人士援助捐献出版费。编辑人员的工作繁重，都是义务性质。投稿人把经过苦心撰述，千锤百炼的文章贡献给学报，都分文不收。多少年来，老的则老骥伏枥，且又诱掖后辈；后学者也潜修磨炼，脱颖而出。他们这样的前挽后推，才能把学报维持到今天。四十五年来眼见一些学术团体半途而废，而我们仍然屹立键在，并且大可于未来的日子里更上一层楼，我们为何不欢呼呢？

笔者参加学会，将近四十年。当时喜读学报上的论述。自问对南洋研究尚未窥堂奥，不敢献丑。有时奉主编之命将国内先进史家名著译为英文，以为补白。不时在学会经济拮据时，四处奔走以资挹注。这且不在话下，我认为值得一说的是与会中的先进们过从，获益不浅。四五十年代最常接触的是陈育崧、许云樵、韩槐准诸人。有时畅谈旧日华侨趣闻逸事，议论风生；有时争辩古时地名对音问题，则面红耳赤；有时结伴同往外地拾取古瓷碎片，每见破碗，如获至宝，兴高采烈。曾几何时三人先后已归道山，缅怀旧事，不胜神伤。但此三位确是学会历史上最突出的人物，我应该在此将他们对学会的贡献及其为人，加以素描，以供后进会员们作为借鉴。

先论许云樵先生。他是学会发起人，也在约二十年间主编《南洋学报》十三卷二十六辑，而且他所写的论文篇数最多，字数也最繁，多是精采之作。云樵的成功秘诀，可以“毅力过人”概括之。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则洋洋万言。立论之前，每先博览群书，引经据典。注释古籍则不畏艰涩，翻检版本。单是南洋研究的著作不下三十种。其他论著及编译也甚丰，可谓“著作等身”。在东南亚恐也无人能出其右，

这都是毅力过人的表现。

文人相轻本是旧时读书人的风气。现代搞学问的人大都认识到虚怀若谷的重要，对他人的见解如有异议则常采取“商榷”的态度。云樵在这方面似乎做得不够。例如他对史学家卫聚贤的言论时加诤谏。新加坡史学家邱新民是个博学的人却被他喻为“西南浪子”。刘士本当初在上海暨南大学从事出版大量南洋研究的期刊和丛书，功不可没。云樵却说他们只会拾取日本人的牙慧。二十年代何海鸣在北京主编的《侨务旬刊》，极力提高中国人对南洋的认识，云樵却讥其有“海客谈瀛”的意识。其实陈育崧曾追述他民国十年在厦门大学时，常读《侨务旬刊》，其中最常撰稿的是叶华芬先生，而且“为文皇皇万言，连续刊载南洋事迹。”十多年后，在星毗邻而居，才知道叶于中日英荷法有关南洋史书无所不读，最难得的是他虽搜索中外群籍，仍感不足，还提倡田野考古。原来叶华芬曾从青云亭的华人神位中和三保山上的甲必丹古墓间，发掘明末以后的华侨史迹，并以英文写成马六甲华人史，确是为华人史学界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陈育崧也看到他另写成有关南洋研究的手稿五大册，可惜在日军南下，惶惶撤退时，已尽付一炬。育崧对叶华芬的钦佩几乎五体投地。1964年叶逝世时特写“以史报故国”一文痛悼之。（见《椰荫馆文存》第二卷411页）象叶这样注重事实的史家如果把当初投给《侨务旬刊》的文章，说是海外奇谈，那是有欠公道的。

古今中外许多研究地名的论著，常用对音来臆测或断定，这原是不得已的办法。但太惯用此法必如履薄冰，一经断误必致贻笑大方。我读西方及日人这类书籍，觉得他们都很审慎，常常因无充足证据而付诸阙如。云樵的考证工

作，在其他方面都相当平稳，但对地名的断定却也有不慎之处。例如他在所著《马来亚史》曾论到单（淡）马锡一名，引述当地西人学者的意见，说意大利史家Ramusio所编的《马可波罗行纪》一文中有一字Chiamassie就是淡马锡的异译。（此说于1949年为F.W.Douglas所倡，而由RolandBradde1附和。详见《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1969年42卷第一辑。）云樵更进而证明此说不错，因为闽南人读淡如Chia（鼻音），故Chiamassie（云樵以中文写成假马锡）即《马来纪年》中的淡马锡无疑。殊不知闽南语有正音和白音之别。淡水白音说成ChiaChui，咸淡说成KiamChia，可是台湾的地名淡水偏读为Dam—Sui，淡薄偏读为Dampo都是用正音。淡马锡用正音是Dam—Ma—Sek。陈育崧是闽南人，深疑云樵之说，便将Ramusio原文请教于意大利领事，经其指出Chimassie是动词，意如英文的is或iscalled。因此育崧写了一篇《许云樵教授‘淡马锡’译名商榷》直指其非。（《南洋学报》第十六卷一辑）结果也被云樵所接受而修改书中这一节。

学会另一突出人物就是陈育崧先生。他年幼即从师学习古文词章，后来入英校专攻英文，可知他中英文早有根基。后来到中国入厦门大学，从名教授习南明史，这也是他后来矢志治史的原由。毕业后曾一度在商界服务。不久之后任提学司督学职。又因有鉴于华校教科书尚缺本地色彩，便辞职创办南洋书局。编印课本之外也刊印有关南洋研究的期刊和丛书。他和许云樵共同组织南洋学会，他们都成为中坚份子。战前在他离开提学司后，笔者继任督学，在日军即将攻陷星洲，被命撤离办公室时，拣得他遗下《陈氏族谱》一册，急

将此书送交于他，遂成好友。过从渐密后，才知道他有藏书癖，他书房内有关西洋中外书籍，琳琅满目。经他怂恿，我也加入学会。日子渐久，又知道他有一种“发现癖”。科学家为了新发现，远去南北极探险；育崧为了好奇也南征北伐去找孤本，去找常人看不到的书，还亲笔抄录，回来写成种种考究。不止于此，他又不畏跋涉，花大量金钱和时间，到各地去找实物来考证。在南京雨花台找到淳泥国王墓的几块残碑，字迹大部分模糊不清，他却有办法从《明史》寻找墓碑的全文。他在台湾大学看到《历代宝案》一书的抄本，那是琉球王朝历代外交文书的总集。在有关三佛齐国的文件中，有几件是宣德六年起由宝林邦（即旧港）的妇人俾那智施氏大娘寄与琉球国王的信。育崧觉得施大娘似是中国式人名而格外注意，后来读莱佛士写的爪哇史发现一个重要的女性名字Gede qinatih，因而进一步研究，结果发现这位在爪哇传播回教的女性就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在巨港扶助成为首长的施进卿的女儿。育崧以英文写下这个长篇故事，而且亲往爪哇凭吊施大娘墓地。

《开吧历代史纪》一书是早年华人记述自万历三十八年至乾隆六十年约二百年间的爪哇华侨史迹，陈育崧曾手录一册。后来由许云樵用以与何海鸣在北京刊印的另一抄本对照而加以校注，共六万余言。1941年育崧往吧又取得吧城档案局荷人范慕伦博士所著《红溪惨案》，请当地识荷文的朋友译述，又花费多个月写成英文，和吧纪校注同时发表在《南洋学报》九卷第二辑。育崧有此毅力，实可钦佩。

育崧一生喜考碑铭，后来也和陈荆和教授合作编著《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由李业霖协助进行田野工作，所集碑

格，无所不有，确是颇具价值的实物参考资料。

笔者曾经参观欧美著名博物馆和图书馆，看到其中很宝贵的或可说是价值连城的珍品，是由一些私人收藏家所赠送，华人肯这样做的则如凤毛麟角。育崧晚年却愿将其一生辛苦得来的藏书，慷慨地送给国家图书馆，俾有志研究东南亚华人史的学人得获纵览，实令人敬仰。

学会中另有一人，使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就是韩槐準先生。他在中国读完高等小学（当时的资格等于秀才）。少年时因生意失败而南来。曾在树胶园中当书记而且兼任割胶工人。有了积蓄便买下新加坡的一家著名药房的股份并在内工作。后来经营化学原料的生意，收入渐丰便开始玩赏古董。他注重研究，利用化学原理来鉴别文物的年代和真伪，比其他玩家更胜一筹。他有一股傻劲，对事物物都要查个究竟。大概有自知之明，便在其居屋挂上“愚趣斋”三字的匾额，请徐悲鸿题署，而且广邀中外文人学士来啖尝园中所种的驰名红毛丹。同时他爱搬出许多古物字画或奇巧的珍藏，让大家品评。因为他最喜欢谈论学术问题，这“愚趣斋”也变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地方。他在学报上最先写考究一类的文字。举凡热带水果、矿石以至大伯公庙、天妃宫及其他古迹的考究，他都有长篇大论。笔者记得曾和他随博物院院长柯凌博士同往Johore Lama收取明代古瓷碎片，他每见破碗烂碟便如获至宝。后来他写一篇《旧柔佛的研究》对古淡马锡即新加坡发生疑问。（见《南洋学报》第五卷第二辑）这引起了西人RolandBradde1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反驳他。（见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刊印丛书Singapore150Years 16页）。他在印尼等地研究许多不同时代的中国出口瓷，用

以断证历代中国与南洋的贸易关系，遂著有《南洋遗留的中国外销陶瓷》。为了继续研究这门学问，便决心在1962年携眷去中国，在大江南北遍寻古窑，准备再写一部巨著。那时他已七十一岁，可他不畏远途舟车劳顿去做田野工作，实在值得人们景仰。1970年病逝于北京。试看他本来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不懂英语，可是许多西方的考古家都造访“愚趣斋”，请教于他，他可说是一位传奇性人物。

学会中有一位比韩槐準更老的老会友，就是刘强博士。他在中国福州任教授多年，日军侵华才南来服务于教育界。他的中英文造诣湛深，写作力亦强。他担任理事多年期间，负责处理一切对外英文通讯以外，《学报》从第一卷第二辑起，每辑都登有他一两篇自英译中或各种论述的文字。据许苏吾先生（《学报》印刷主持人）说，刘博士在《学报》上发表作品之多仅次于许云樵。刘强是研究婆罗洲的专家，他把西人著述译为中文，又把《学报》上重要文章译为英文以饕不谙中文的读者，促进沟通作用。他为人寡言笑而深居简出，人们因而忽略了他对学会所作的贡献。

此外，我们也不要忘记几位与学会有极深切关系的人物。张礼千和姚楠二位先生是学会的发起人。张礼千已逝世多年，姚楠却是硕果仅存。日军攻陷星洲前，他两人撤退至重庆，继续以南洋学会名义出版丛书九种。此外宋杰勤先生也是早期最热心投稿的人，他仍健在。和姚楠先生一样，时时关心学会的发展情况。

笔者写到这里觉得时势的变迁对学会和学报有很大的影响。以下把我近来的几点感想和建议，提出来讨论。但笔者不是一个学者，全祈大家指正。

（一）充实中文篇幅——笔者翻阅过去七八年的学报，有一时期似有中英并重的现象。增多一些西方的学者参与撰稿固然是好，但中文稿件却似乎渐有枯竭之态。直到崔贵强担任主编，努力写稿，竭力维护中文的篇幅。我猜测在这个期间，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多在新加坡大学执教，他们多用英文写作。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学会会员。我想大可请求他们将所写的论文翻译为中文，以丰富中文篇幅。事实上南洋大学出身的学术界新秀甚多，他们十年来都各有专著。（其中有一些已列入为南洋学会的丛书）他们都是学报稿件最好的来源，学报主编或可多加鼓励。

（二）扩充研究的范畴——学报一向侧重刊登中国与南洋关系的历史研究和华侨史迹，其他论述所占成分较少，而且过去研究的方法比较守旧而笼统。近几年从事研究华人社会的多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各以他们的专门的知识独特的角度或综合其他专家的观点来分析现状。我们应多多搜集这类的作品来充实学报的内容。

（三）扩大研究的地区——说来实在令人惭愧。我们自称南洋学会，我们研究对象应该包括全东南亚各地区，可是学报上所刊载的多局限于马来西亚，至于印尼、印度支那、菲律宾等地区几乎阙如。早期学报虽有十来篇文字是有关于泰国和缅甸的研究，可是并不深入。至于其他三个区域和中国发生关系都比星马更早，史书上关于这些地区的记载更多，华人在这些地区的活动也更早，可是我们大多数的会员几乎一无所知，真是一大缺陷。这些地区有如一大金矿，可使我们发掘不尽。我希望此后学会应鼓励一些学者向这方面进

展。

（四）鼓励田野工作——历史研究一直注重古籍上的资料并非最好方法。许云樵在五十年代所著的《马来亚史》说新加坡古名蒲罗中，“其人皆有尾五六寸……，其俗食人。”这是他根据《太平御览》所下的定论，而且也为学校教科书所采用。二十年后史学家饶宗颐引用史书指出虽有蒲罗地名并无中字，而且不可能在新加坡。许不服便征引古籍证明确有中字，于是引起大论战，各以数万言的长文来证明有无“中”这个字，陈育崧最后也加入论战，说这个地名难以令人相信。可见仅引用古籍是靠不住的。前面说过陈育崧非常钦佩叶华芬以实物考证而写成《马六甲华人史》。他后来也用田野工作的精神来考证几项历史事迹。韩槐準因在Johore Lama拾得大量古瓷碎片而证明新加坡并非古时的淡马锡。考古家柯凌博士亦赞成其说。因为从来没有大量古物出土，也不可能是古龙牙门。几年前吉隆坡博物馆在柔佛东海岸外的Tioman Island掘出大量中国古瓷破片，笔者认为这确可证明郑和航海图上所画的麻岛，才是古时的一个中国商船往来的交易站。本会德籍会员傅吾康教授花了十几年工夫奔波于东南亚各地专门寻找抄录华人古墓碑，著了几本书，这是田野工作的最好榜样。南大出身的李业霖等也曾协助陈育崧搜集新加坡华人碑铭。林孝胜专长口述历史工作，有其独特表现。笔者认为学会或可鼓励会员在这方面多下工夫，以便对南洋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注重学术交流——这可分国际性会议和座谈会两种。

（一）国际性会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战后各国学

术界有一种新风气，就是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邀请外国学者作学术交流。二十多年前在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历史家国际会议，本学会会员也被邀请参加，宣读论文。十几年前，学会代表和香港学人进行交流，双方先后在两地的电视台举行座谈会，这是很特别的形式。1984年八月本会召集一个较大规模的国际研讨会，题目是“早期华人移民美国及东南亚”，邀请美国与本国学者参加，公开讨论，为期二日。1985年秋中国东南亚历史学会厦门分会邀请本会派代表参加学术交流，双方获益不浅。1986年春台湾几个学术团体和本会联合主办一个国际研讨会，题目是“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本会代表所读论文，颇受重视。本会又将于1987年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行又一次会议。南洋学会是纯粹民间组织，能如此受人重视，实非容易。笔者认为此后宜增加以华文为媒介的讨论会，可使更多会员受惠。

（B）专题讲座：从五十年代起我们已主办了二三十次讲座，邀请国内外专家演讲。而且每次与会听众提出问题，谈论风生，兴致勃勃。愚意以为讲题不可太专门化，免令普通听众裹足不前。

（注：本文为南洋学会45周年纪念论文）

澳华历史、现况与将来

澳大利亚阿德华德大学历史系教授 顾清煌

（一）澳洲华人的历史

拿中国一句老话作为本文章的开场白，那就是：历史如同一面镜子。本文的目的在于检讨华人在澳洲的历史和现况，以作为澳华社会将来发展的借鉴。

那些懂得多少澳洲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早期华人在澳洲受尽虐待和欺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华人遭受了种种的歧视，他们在“白澳政策”下呻吟。在“白澳政策”下种族歧视合法化，同时华族的移民受到种种限制和排斥，在这没有温暖的异土，他们被鄙视，被迫害，他们对澳洲的贡献被抹杀，而他们的吃苦耐劳的美德都被认为是对澳洲社会的一种威胁。

早期的华族移民也过着非常寂寞的生活，由于法律的限制，他们不能把妻儿带到澳洲来定居。他们只能孤单的生活，辛勤的劳动，希望能把血汗换来的钱储蓄起来，以便将来回到故乡欢度晚年。

早期华人在澳洲遭受歧视和虐待是有社会、经济、政治和种族等因素的。大部分早期华人来自广东，尤其是在广州西南部的四个县镇，那就是著名的四邑：台山、开平、新会和恩平。广东农村的严密社会组织给四邑的移民一股强大的

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和华人的传统的勤劳俭朴的美德相结合，那就是淘金时代华人淘金者成功的重大因素。

但是成功给他们带来了白人的妒忌和仇视。虽然华人淘金者没直接威胁到白人金矿主的利益，但白人总把华人当作可怕的竞争者。所以金矿主利用他们的政治力量把华人从金矿驱赶出去。其实，华人对白人的经济威胁和竞争，主要是在家具制造业、零售业、以及蔬菜和水果的批发方面。华人传统的勤俭，使他制造出来的家具价廉物美，因此，白人的家具业深受打击。

在政治方面：1880年代兴起的澳洲民族主义把反华运动当作一种实现他们团结的手段。澳洲的劳工运动把华工当作他们失败的代罪羔羊，他们认为华工的低工资和长工作时间的习惯危害他们的利益。因为华工减低了他们与雇主讨价还价的机会，并且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他们的眼中华工是天生的奴隶，自愿成为资本家压榨工人的工具。

在种族方面，华人与欧洲人在外貌肤色、发型和衣着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加之，华人讲不同的语言，信不同的宗教。这些差异很自然地引起白人的误会、畏惧和敌视。同时，早期的华工大部分都是从穷乡僻壤到澳洲来的，他们是所谓“文化的边际人”。他们目不识丁，行为粗俗，这给早期华人制造了不好的形象。因此华工成为白人讥笑和轻视的对象。由于缺乏文化修养，早期华工也无法与舆论界和政府作有效的交涉。

如果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话，十九世纪回到澳洲的华工就不会遭受种种的虐待。可惜的是当时清政府软弱无能，无法保护在外的华侨。“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很对